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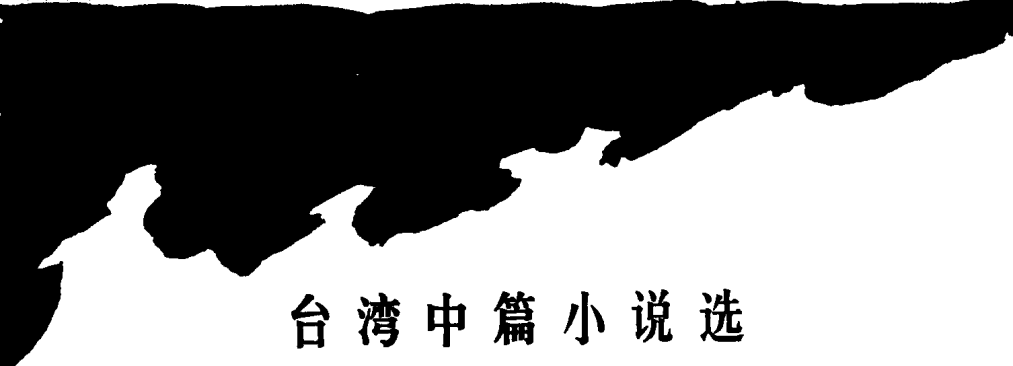
台湾中篇小说选

波茨坦科长

封祖盛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台湾中篇小说选

波茨坦科长

封祖盛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台湾中篇小说选

波茨坦科长

封祖盛 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2.126印张 插页2 302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8,000册

书号: 10113·286 定价: 1.25元

00616

编者前言

五四运动以来，台湾文坛产生了许多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属于台湾乡土文学的范畴，基本上出自台湾省籍作家之手。本书所收集的七个中篇小说，都是台湾省籍作家写的，是台湾乡土文学优秀之作，饶有台湾乡土特色。它们分别产生于台湾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日据时代的，有光复初期的，有当代的。在编辑此书时，由于要考虑到广大读者的欣赏习惯，所选用的作品，不一定是各时期台湾乡土文学中篇小说之最佳者。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台湾乡土文学中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从中可窥见台湾现代历史和小说艺术发展之一斑。

《模范村》是台湾在日据时代中篇小说创作重要收获之一。它的作者杨逵，曾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先后十余次被日本殖民当局抓去坐牢，受尽铁窗之苦，却毫不屈服，民族气节昂扬天外；在异族铁蹄下，仍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以赖和为开拓者的台湾现代乡土文学的优良传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以笔为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创作了好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他们的思想性在那时的台湾文坛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艺术上也较成熟。《模范村》即是其中的一篇佳作。

在日据时代，台湾的乡土文学在艺术上一般都比较幼稚，有的还较粗糙。《模范村》却是精心之作，作者颇为熟练地掌握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一些规律，对日据时代的台湾农村生活进行

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艺术概括。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积极准备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为此而加紧掠夺台湾人民，把台湾变成扩大侵略的前进基地。小说以此为背景，展开台湾农村生活画面，描写日本殖民者如何以建设模范村为名，与汉奸地主相勾结，压迫、剥削广大农民，使他们贫困至极，苦不堪言，并千方百计破坏、瓦解他们的反抗斗争，细节真实比比皆是。诸如萧乞食的两个儿子在烈日下犁田，父亲一再要他们歇息；萧乞食、慧金福、刘见贤等农民在店铺里闲聊，发泄不满，捡拾烟蒂；书生陈文治穷到连买盐的钱也没有，赊盐时被老板娘奚落，扭头而去；慧金福有气力而没地种，惨死于岩洞里；汉奸地主阮固老头用收回佃农垦熟的荒地，另租给日本糖业公司的方法，牟取暴利；木村警长与阮固老头狼狈为奸，共同策划阴谋，妄图诱走爱国青年阮新民，借以瓦解农民的反抗斗争，等等。这一切细节，都写得很是质朴、真实，饶有生活气息。就在这些细节真实的描写里，作品颇为鲜明地刻画了阮新民、陈文治、阮固、木村等人物形象和一群农民的群象，从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意义上显示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艺术地再现了那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把一些带本质性的东西揭露出来，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加紧掠夺、奴役台湾人民的罪行，发出了台湾人民首先是青年民族意识、阶级意识日益觉醒的呼喊。

日据时代的台湾乡土文学，大都是客观写实的。它们以暴露日本殖民者统治下台湾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为自己的重要特征和鲜明旗帜。二十年代，由部分台湾留日学生组织的台湾文艺研究会编印的一种杂志，在创刊宣言中称：“台湾被编入为日本人的殖民地以来，在这特殊的国情和经济上被榨取的政策之下，我们的确喘不过气来。而且一向又留恋于大家族制度，迷信邪教，被歪曲的儒教思想，宿命的天命思想和佛教结合的结果，都发生不少的精神的毒害。”本着对台湾社会的这种认识，广大台湾乡

土作家便以揭露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人民的罪行，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战斗使命。杨逢的《模范村》在思想上却明显地高于当时台湾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它通过塑造日本警长木村和汉奸地主阮固的艺术形象，描写殖民势力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压迫农民的故事，在发出反帝的呐喊的同时，也发出反封建的呐喊，既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又表现了鲜明的阶级意识，把反帝和反封建的任务联系起来，这是胜于当时台湾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一筹的。同时，这个作品在表现陈文治向青年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的时候，内中有这样的描写：“陈文治讲着，把手里的书放下，拿起另一本书翻读。这些青年人既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看过报纸，很多事情自然是听不入耳的。不过，台湾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曾经把台湾占领了，叫台胞过着牛马都不如的生活……这是大家由日常得来的很切实的经验，不会不知道的。台湾虽然被日本人管了，不过，我们还有祖国存在，这是在隔海那边……大家也约略知道一点的。今天听到日本想把整个中国都吞下肚里去，免不了要发生深切的感触。”很明显，在这些描写里，作者明确无误地把台湾看作是中国的领土，以中国为台胞的祖国，把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控诉日本并吞台湾、侵略中国大陆的罪行，这也是胜于当时台湾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一筹的。此后，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钟理和的《原乡人》等好些台湾文学作品，热烈讴歌台湾青年回归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斗争，可说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波茨坦科长》是反映台湾光复初期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个作品，其作者吴浊流已于一九七六年病故。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负隅顽抗，拚命搜刮台湾的民脂民膏，已使台湾经济濒于破产。日本投降后，由于战争的严重破坏，加之国民党接收官员腐败无能，台湾经济便一片凋败，人民生活苦

不堪言，比大陆同胞更苦。仅就物价而言，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平均涨了一百倍。其中，米涨了四百二十倍，煤涨了四百三十倍，糖涨了七百九十倍，火柴涨了一千倍，盐涨了一千六百倍。在这种情形下，台湾同胞对于回归祖国从满怀希望到严重失望，整个台湾社会陷于动荡不安之中。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以及许多作家尚未学会中文，反映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便为数不多。被一些台湾作家誉为“铁和血铸成的男儿”的吴浊流，确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勇者。他象在日据时代冒险创作《亚细亚的孤儿》，揭露日本殖民者的罪行一样，不顾一切地创作《波茨坦科长》，暴露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黑暗，表现台湾同胞对于回归祖国从满怀希望到严重失望的思想感情历程，把矛头指向贪官污吏。

这篇小说表面上是写两对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故事；但它并不是一般的言情小说，而是社会写实小说。这两对青年，女的都是台湾人，天真烂漫，对回归祖国怀着热烈的希望，男的则都来自祖国大陆，他们曾经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后堕落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又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派往台湾的接收官员。小说以这两对青年男女主要是范汉智、张玉兰的爱情婚姻故事为线索，展开对台湾光复初期社会生活丰富多采的描写，着重揭露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的现象。在台湾光复初期，从大陆赴台的一些坏人、骗子，乔装打扮，巧施故技，使不少纯真的台湾少女上当受骗。这些少女怀着对祖国憧憬之情，误把坏人、骗子当作来自祖国的亲人，很快便以身相许。这就如口焦唇裂的人误喝有毒的水那样，不足为怪。《波茨坦科长》写两位台湾少女分别误嫁给两个汉奸，所概括的就是这一生活真实。然而，作者醉翁之意并不在此，而在揭露当时台湾官场普遍存在的十分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因而不在儿女私情、家庭琐事上大做文章，而是着重描写两个政府官员主要是科长范汉智如何利欲昏心，拼命搜刮财物，并

科用职权，与奸商勾结，投机倒把，贪污受贿，最终被捕法办，把两位少女的希望彻底毁掉。很明显，这两个政府官员是被作为官場黑暗面的代表人物加以描写的，两位台湾少女对于他们从希望到失望的思想感情变化，反映了广大台湾人民对于政府从希望到失望的思想感情变化。在这些描写里，作品又大量地穿插进阴暗的生活画面，诸如人们接收日产的争夺战、火车站乞丐成群、高雄市荒凉一片、小学生叫卖香烟，等等，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作品批判贪官污吏的力量。它用艺术形象显示了，正是那些贪官污吏，把台湾弄得一团糟，使广大台湾同胞大失所望。因此，整篇小说虽然存在着作者对故事进程从旁干扰过多、叙事较粗、情节描写不够生动等毛病，仍不失为光复初期台湾社会形态一份很可宝贵的真实记录，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台湾当局把它列为“禁书”，妄图把它从历史上抹去，更显出这份记录之可贵。

《雨》的作者钟理和，是大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作家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在短暂而又穷困的一生中，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创作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它们以特有的思想艺术光彩，吸引了广大读者。

《雨》是很能体现钟理和的创作风格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农村，这时久旱不雨，农民们祈祷下雨。作品以自然灾害为背景，描写了人间的种种不平，相当成功地塑造了农民黄进德的形象。他是一位贫苦农民，日据时代被拉伕入伍，在生死患难中与另一贫苦农民徐龙祥“结拜同年”。战争结束后，徐龙祥下落不明，他便忠诚于徐龙祥之托，毫无私心地照顾徐龙祥一家大小的生活，用自己的名义向地主租到一块“三七五田”（法定租金较便宜的一种田）给徐龙祥一家耕种。岂料一个与徐龙祥的妻子有暧昧关系的人唐有福从中作梗，趁徐家生活困难之机，要徐家为了得到一些眼前的好处，把田退还给头家出卖，买方是在日据时代作恶多端的罗了瑞。黄进德知道

后，生怕徐家从此生活失去保障，自己有负于“结拜同年”之托，便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竭尽全力制止此事。作品用主要篇幅写他如何开导、教训徐龙祥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严厉警告鹿有福别“串通罗丁瑞骗那女人”，在镇调解委员会上怒斥罗丁瑞，大灭其威风，并上门警告罗，说若买徐龙祥的田，“那不会有好结果”。当这一切都无效后，为了替徐家清还欠罗家的债务，保住徐家那块田，他便走进赌场，大注下赌，象发了狂一般。这一切描写，特别是对他在镇调解委员会上怒斥罗丁瑞和进赌场狂赌的描写，是那样痛快淋漓，绘声绘色，入木三分，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相当突出地刻画了他作为农民的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把他忠诚、耿直、倔强的优良品质，连同思想简单、脾气粗暴等弱点，和盘托出于读者面前。他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农民型的，令读者感到他虽是作者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的结晶，在他身上凝着作者的许多心血，却并不露出艺术装饰的痕迹；他就象实际生活中的农民一样，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作品在刻画黄进德的形象的同时，又紧密联系徐家退田这中心事件，描写他的女儿黄云英和徐龙祥的儿子徐火生，由于深受这事件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爱情悲剧，最后一个服毒自杀，一个出走外逃，从中塑造他们的形象。在他们身上，那带着泥土气息的勤劳、朴实、忠厚，以及比较狭窄的胸怀，被写得维妙维肖，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小说就这样围绕着对于黄进德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展开五十年代台湾农村的现实图景，一切都显得很质朴，人物形象质朴，生活画面质朴，艺术语言质朴，表现手法质朴。总之，整个作品强烈地呈现出钟理和创作的一贯风格——质朴的现实主义风格。

读者在这风格质朴的现实主义艺术世界里，可以分明看到五十年代台湾农村实际生活的情形，尤其看到了存在于其中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和钟理和的其他小说“哀而不怨”、“温柔

敦厚”的基调有明显的不同，《雨》颇为有力地揭露了作为农村恶势力代表人物的罗丁瑞的剥削罪行，并讽刺了那些站在他一边的乡绅们。作者对于恶势力愤慨之情，鲜明可见。作者正是怀着憎恶恶势力和同情苦难农民的情感，用艺术形象真实地显示出，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农村，广大农民深受恶势力的压迫、剥削，加上天灾，生活十分困难，处于无助无告的境地。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农民奋力挣扎，欲帮助苦难者摆脱困境，结果非但不达目的，而且连自己也掉进苦难深渊而不能自拔，招来悲剧结局。由此，作品便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社会问题：台湾农民在挣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枷锁之后，怎样才能做自己土地的主人，战胜天灾人祸，过上幸福的生活？

如果说《雨》所反映的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那么，《素兰要出嫁》、《我爱玛莉》、《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云》所反映的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就逐步发展成为其经济结构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工商社会了。这些小说的作者王祯和、黄春明、曾心仪、陈映真等，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作家。他们在开始登上文坛的时候，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受到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背离了台湾乡土文学现实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创作了一些抛弃广大社会的客观真实，热衷于表现“现代人”心灵世界的作品。之后，在现实的教育下，经过开展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逐步正视台湾社会的广大人生，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用自己的笔去揭露台湾社会的种种矛盾，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抒发民族感情。

王祯和的《素兰要出嫁》，和作者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着意于描写“小人物”的不幸。小说的主人公辛先生，原是一个官方机构的公务员，资历深，文化高，在社会上颇有地位，一家生活也过得去。可是，他女儿在准备升上大学考试的过程中，得了精神病，为了给女儿治病，他花了许多钱，入不敷出，寅吃卯粮，还

欠下一身债。他只好提前退休，拿所得的退休金和友人合股开办大理石工厂，希望从此踏进美好的天堂。可是，工厂才办不久，由于产品滞销，就关闭了。他的投资，连一块芋仔蕃薯也拿不回来。他只好另寻生计，离家到山区去当看林人，沦为“小人物”。小说写他及他一家的种种不幸，诸如他女儿出嫁后受尽丈夫的虐待，他跌倒受伤致残，等等，艺术构思虽然巧合过多，一连串不幸都发生在辛先生身上；但具体描写却相当真实，对今天台湾生活的许多实际情形，如公务员有退休金，却无公费医疗，学生也无，一旦身患重病，巨大的经济负担就会使他们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公务员任职期间有公寓居住，退休或退职之后，便得把公寓退掉；人过了四十五岁，若是失业，便难以找到工作，在城里丈夫养活妻子理所当然，妻子出去社会工作，有损丈夫的名誉，等等，都作了真实的记录，甚至连辛先生一家的收支状况，也按照一般标准，列表说明。这对于台湾省外的读者了解台湾的实情，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从乡土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其主要意义并不在此，而在表现人们的互助精神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在台湾，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金钱这把利剑正在把中国社会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撕破。王拓的短篇小说《金水婶》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素兰要出嫁》则抓住现实的另一面，写辛先生一家面对不幸和困难接踵而来，一个个都以家庭整体利益为重，乐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彼此和睦相亲，共度难关，甚至连局外人梁传达也对他们深表同情，伸出救援之手。这一切，看来很平凡，但在重钱薄义的台湾现代社会里，是十分难得的。这使得辛先生等形象具有一种新的面貌，那就是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精神，那是在今天的台湾文学中极少见到的。同时，辛先生借讲英国福利制度，表示对台湾社会没有福利保障的不满和改革现状的希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其社会理想止于英国的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大众摆脱贫困的福利制度，属于改

良主义的范畴。

黄春明的《我爱玛莉》，是一篇颇为出色的讽刺小说，它通过刻画大卫·陈的洋奴嘴脸，对洋奴思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众所周知，台湾的经济主要是在外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由此而导致了整个社会洋奴思想十分严重，民族意识日益淡薄。《我爱玛莉》所暴露的，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被叫做洋奴，主要是因为他们毫无民族意识，充当洋主子的奴才，尽心去为洋主子办事，办只有利于洋主子而有损于自己同胞的事。文学作品刻画洋奴的形象，最简捷的方法，莫过于直接描写他和洋主子的关系了。黄春明写《我爱玛莉》，却舍此捷径，而用曲笔勾勒大卫·陈的洋奴丑态。他巧妙构思，别开生面，着重通过描写陈在新旧洋主子交接之际，如何疼爱旧洋主子赠给他的一条洋狗——玛莉，表现他极度洋化，以讨得新洋主子的欢心，稳住旧洋主子赐给他的经理位置。作品仅是这么写，就已使陈的洋奴轮廓，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作品用对比手法展开故事情节，写陈一方面如何疼爱洋狗，另一方面如何打骂妻子，两相对比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把陈的洋奴相暴露无遗。

陈的妻子玉云是一个十分怕狗的人，对普通的狗她已怕极了，何况是一条高大的洋狗（实则是杂种狗）。因此，从一开始，她就非常反对丈夫养狗。然而，丈夫一向十分专横，当他说“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已决定了”时，她便只好逆来顺受。之后，在养狗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闹剧。先是狗把陈爱之若命的兰花盆打破，玉云一一收拾残局。后是狗挣脱了绳子，从天井跑进客厅、厨房、卧室撒野，把整个家搞得乱七八糟，弄破了不少东西，玉云又一一收拾残局。接着是玉云带狗出去溜达，碰到野狗，拿石头去吓野狗，连自己牵着的狗也吓跑了。她追赶自己的狗，重重地跌倒在路上，把膝盖跌破了，鲜血淋漓。玉云如此服

侍狗，丈夫应当是心满意足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一次狗恶作剧，玉云都免不了受丈夫指责，甚至臭骂，说“你在家里到底干什么的”，“你笨蛋”。当她还嘴时，丈夫便用恶言骂她，说“给我闭上你的狗嘴”。更有甚者是，有一次，玉云出门去了，玛莉挣脱锁链，走出门外和野狗偷情，这是大卫·陈最忌的。因为卫门夫妇赠玛莉给他时，再三嘱咐绝不能让玛莉和土狗交配，生出杂种狗来。玉云把此事告诉丈夫，尽管低声下气，连声说：“对不起”，陈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抓过来左一掌、右一掌地打，一边骂“你死好了，你死好了”，“你讨厌狗，你就存心破坏我”。玉云哭过之后，冷静下来，决心离家出走，不再受丈夫的洋罪，便问丈夫道：“你爱我，还是爱狗？”丈夫疯也似的叫道：“爱狗！”事实也确是这样。他对于自己的妻子如此肆无忌惮，凶恶至极，而对于玛莉却爱护备至，体贴入微，买名贵的狗罐头给它吃，用英文亲昵地叫唤它的名字，经常用手抚慰它，轻轻拍它，给它搔痒，甚至还让它伸出舌头舐自己的脸，当玛莉和野狗偷情后，他又不惜化费重金聘请名医，给狗打胎。可见，他对于妻子和对于狗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这么一对照，大卫·陈爱狗胜于爱妻子的思想感情便被表现得十分充分，和盘托出了他的一副洋奴相。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这个人，本来是不喜欢养狗的。玉云要他改养小土狗时，他说：“你错了，你以为我喜欢养狗吗？我只想养卫门家的狗。”养洋狗，只是他醉心于美国生活方式，极力巴结讨好洋主子的一种手段而已。《我爱玛莉》集中笔力在狗上做文章，并且用对比手法表现大卫·陈爱狗胜于爱妻子，戏剧效果相当强烈，确是对于洋奴思想的尖锐讽刺。

曾心仪的《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是作者构思了十多年的心血之作。它描写一个高中女生辍学，沦落风尘当舞女的故事。在今天的台湾，不少少女受家庭困境所逼，沦为风尘女子，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作者在他的小说集《我爱博士》“自序”中所说：“多年来，我看到周围太多的少女毅然放弃追求个人的幸福，为了解决她们家境的贫困，沦落风尘。”《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所概括的就是这严酷的社会现实。小说描写主人公翠华沦落风尘，并没有象某些作品那样尽情展览欢乐场中的形形色色，而是着力揭露使主人公沦落的社会经济原因。在小说里我们看到，翠华从小就是一个乖巧的女孩子，单纯、聪明、勤快、好学。可是，她家境贫穷，“家庭里的每个人，时时遭受着贫穷的鞭挞。生活于他们的意义，狭窄到只是战年累月地烦恼匮乏衣食。这个问题愈来愈暴露，愈严重了”。她的弟妹们先后患病，家里为医治他们已欠下许多债务。她一家住的“违章建筑”破烂不堪，危在旦夕，向上方申请建屋费而不得，只好向亲友贷款建屋，又欠下一笔更大的债务。尽管她双亲克勤克俭，“债务仍象滚雪球，愈滚愈大，有时连利息钱也付不出来”。在这样的困境下，当一个洋裁师傅欲调戏她、吃她豆腐而不得，骂她“摆什么小姐架子？你父亲还欠我钱哪”时，她便感慨万端，深感“社会真现实！只是三百块钱，就扫尽人的尊严”，“父女都受到侮辱”。加之她对学校教育逐渐丧失信心，“社会上已流传着大学生找事困难的说法”。于是，她把心一横，放下书本，走向一个满是黑暗、丑陋、卑下的场所，当舞女去。这些描写，虽然还没能象陈映真、王拓、杨青矗等的一些作品那样，从阶级剥削的意义上揭示劳苦大众贫困的根源，却也鲜明而有力地显示了，翠华所以从好学生堕落为风尘女子，并非她天生下贱，而主要是因为她家境穷困，这穷困是社会造成的。也就是说，她走向沦落，是被迫的，被客观社会环境所迫的。由于这样，她的悲剧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作品通过对她的悲剧的描写，提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种社会性，又因写她后来欲悔改自新而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作品写她在风月场中

受尽折磨、凌辱，心灵和肉体都苦不堪言之后，便想回到正常的社会中，重新做人。她先是回母校申请复学或考插班生，却遭到校长坚决拒绝，原因是她当过舞女，生怕她“破坏了本校的名誉”，没办法，她只好到一个公司去当雇员。在那里，她和一男青年互相产生了爱情，并成了家。婚后，尽管他们彼此都真心实意地相爱，但男方的父母只因为她当过舞女，极端轻视她，常常恶语中伤，指桑骂槐，令她十分痛苦。不很久，她和丈夫之间，也因此产生严重不和，并于怀孕后被丈夫抛弃，陷进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小说从这些描写里反映了冷酷的生活现实：翠华沦落风尘虽是社会所迫，却得不到社会的谅解和同情，乃致于她要跳出火坑，重新做人，社会也无情地加以拒绝。社会，不合理的社会，使许多少女丧失了寻求幸福的权利，无可挽回地走向黑暗，这正是《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对台湾社会的指控。

陈映真的《云》，描写一个美国跨国公司台湾分公司属下的一个工厂改组工会的一场斗争，斗争之激烈和复杂程度，为台湾当代文学所罕见。这个工厂的工会头头们，受台籍的资本家代理人操纵，充当资方附庸，所作所为与工人利益背道而驰。一个新上任的分公司美籍总经理深感这有碍于跨国公司的发展，便怀着建立新时代的跨国企业的理想，授意和支持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台湾青年，发动工人，重组工会。结果，在关键时刻，由于资方代理人 and 工会头头极力破坏，总公司远东区的美籍总裁横加干涉，分公司的美籍总经理临阵退缩，改选工会头头的工作便宣告夭折。通过这些描写，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今天台湾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民族矛盾，劳资矛盾，工人内部矛盾，资方内部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作品的故事情节，基本上就是这些矛盾的艺术表现，其中主要是劳资矛盾。而作品表现这些矛盾冲突，又相当真实，再现了生活的本来面貌，诸如资方用金钱收买和支持工贼，工贼用金钱利诱、政治恐吓的方法瓦

解工人斗志，女工们用各种方法进行斗争，等等，都写得真切动人，使人看后产生亲临其境之感。这是作品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然而，作品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它描写改组工会这场由上而下发动的失败的斗争，用艺术形象显示了，外国资本家及其在台湾的代理人，他们的“善心”，他们对于劳工利益的“关怀”，是以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永远只许到达不与自己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的边缘，他们所制订的改革措施，一旦触犯资方的根本利益，就会被他们自己毫不犹豫地踩在脚下。无疑，这是对于台湾带殖民地性质的经济结构由上而下的改革的一种否定。而这种所谓改革，又是台湾某些人所极力鼓吹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在否定由上而下的改革路线时，满腔热情地塑造了何大姐、小文、鱿鱼等一群富有反抗精神的工人形象，歌颂他们的团结战斗及其伟大潜力，使人感到这股力量目前正受到沉重压抑，一旦爆发出来，将无往而不胜。这就是《云》的题旨所在，从中表现了作者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群众的团结战斗上，发出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强音，标志着这种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达到了新的水平。

《云》在艺术形式上，也同样达到了新的水平。作者基本上用现实主义方法去写这个作品，却又不受此方法传统技巧的局限，积极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技巧，使之为更好地反映现实服务。这表现在：首先，采用多层次的结构艺术，交错时空。小说故事背景的时间颇长，有两三年之久，空间也颇广阔，有城市，也有农村，在城市中有台北，又有中坜，且人物众多，矛盾复杂。作品用多层的结构形式，概括所要描写的一切。第一个层次是张维杰离开跨国公司后做生意的生活，作品由此写起，又到此收笔。第二个层次是张维杰的回忆，主要是回忆他在公司时参加重组工会的工作。第三个层次是小文的日记，记述工人们重建工会的活动和家乡的生活。如此多层次的结构，交错时空，为传

纯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少见。其次，用多种叙事观点展开故事。整个作品主要用张维杰的观点叙述故事，看上看下，颇为全面，中间穿插进小文的日记和艾森斯坦的著作，以弥补用张维杰的观点叙事，难以深入工人和高级管理人员思想之不足，扩展了作品的视野。再次，在一些地方用了象征手法。如写天上的云“那么快乐，那么和平，那么友爱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轻轻地挽着、挽着”，借此象征工人们应当携手并肩，友爱团结。作者如此把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技法吸收到乡土文学创作中来，力求表现方法丰富多采，这对于丰富和发展乡土文学的写作技巧，是有积极意义的。

台湾乡土文学源远流长，中篇小说甚多。本集所收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以上对于所选作品的简略介绍、分析，若有不当，欢迎读者指正。

封祖盛 一九八三年三月
于广州中山大学